

转移立足点 服务工农兵

麻城县东路花鼓剧团党支部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伟大纲领。几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推动下，我们坚持狠抓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演员职工的立足点的转移，坚决把演出的重点切实放到农村去；带领全团同志，肩挑道具行李，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边，脚行千里，戏送万家，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被群众誉为“扁担剧团”。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剧团获得了新生；《讲话》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道路，是建设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必由之路。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统治下，我们剧团的许多人演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想的是怎样成为高踞于工农兵头上的精神贵族，剧团实际上成了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和培植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狠批了这条文艺黑线，认识到只有和文艺黑线统治的十七年对着干，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才能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工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要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必须彻底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号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加深的。一九七〇年剧团重建时，有的同志认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批判了文艺黑线，班子是新的，人员是年轻的，演的又是样板戏，今后只需留在城里把基本功搞上去，方向道路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结果，演员自以为学得了样板戏的一招一式，演得维妙维肖，群众却不欣赏，还批评我们是依样画葫芦，“不是演戏是做戏”，没有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大形象表现出来。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使我们联想到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批评，说他们对工农兵群众的描写，“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缺少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所以不可能真正地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我们引导演员职工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才能把立足点逐渐地移过来的教导，学习“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

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的教导，使大家认识到表演基本功固然要练，但更重要的是要练好思想基本功；如果不首先在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的过程中逐渐地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不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立场问题，那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仍然只是一句空话，就不可能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从那时起，我们党支部开始把演员职工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来抓，把训练的基地和演出的重点摆在农村，并组织演员到农村社队蹲点劳动，既当社员，又当演员，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摔打、锻炼，有效地促进了演员职工世界观的改造和表演艺术的提高。贫下中农夸奖我们“上台是演员，演得真；卸装是社员，心贴心。”

农村剧团把演出的重点放到了农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呢？不是。一九七一年夏季，我们到一个边远山区演出，带着剧院演出时的全套布景道具，队里派了二十多个壮劳力才搬上山。群众意见很大，说“戏是好看，东西难搬，这样的戏我们看不起”。后来我们到另一个山区大队演出，布景道具一件没带，演出时不挂大幕，不变台景，群众看了不满意，批评我们“演戏‘不变台’，这是应付”。对于贫下中农的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开始想不通，说是“东西多了难得搬，东西少了不好看，真是叫人左右难”。党支部认为，这种埋怨情绪实质上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影响下那种“我演戏、你出力”的“演员高贵”“艺术特殊”论的反映，说明“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的“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的指示，认识到光有为贫下中农演出的好心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如何演好的方法。讲“派头”的戏贫下中农看不起，效果不好，“不变台”的戏贫下中农不爱看，效果同样不好。效果问题也是个立场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我演戏、你出力”的旧传统，为贫下中农演好戏，必须继续转移立足点，打掉“正规”剧团的框框，放下演员的架子，把扁担从贫下中农肩上接过来，自挑道具行李，上山下乡，送戏上门。

演员挑扁担，这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向工农兵方面、向无产阶级方面转移立足点的重要步骤，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勇敢挑战。贫下中农热情地赞扬我们“扁担剧团上山，布景道具自己搬，送戏送到家门口，贫下中农笑开颜”。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一样，围绕着挑扁担还是扔扁担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有人讥笑我们“有车不坐充好汉，剧团象个搬运站”，少数同志的思想上也起了波动，说“一日三身汗，不如货郎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们的扁担越变越薄，担子越挑越轻，步子越走越小，个别演员甚至干脆扔掉了扁担。党支部意识到，这些同志思想上波动反复，行动上怕苦怕累，说明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充分的认识，思想感情还没有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立足点还没有彻底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要完成这个任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们一方面组织大家继续学习《讲话》，学习毛主席关于“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教导，鼓励同志们继续肩挑重担迈大步；一方面请贫下中农讲过去用扁担挑脚送医的血泪史和今天靠扁担改天换地的创业史，请老红军讲当年拿起扁担闹革命的斗争史，激发大家对扁担的阶级情感，认识到“扁担剧团”贵在扁担；这扁担，是从革命前辈肩上接过来的一杆枪，是衡量思想改造的一把尺，是转移立足点的一个开端，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

线的一个标志。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汽车只能帮我们转移演出地点，但不能代替我们转移立足点”，表示一定要把革命的扁担永远挑下去。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立足点的转移，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正是由于努力实践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我们才有了一些进步，受到工农兵群众的欢迎，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鼓吹“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时，胡说什么“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这真是颠倒黑白。他的罪恶企图是要篡改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把文艺重新扭回到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的邪路上去，使文艺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革命文艺战士决不答应。我们决心永远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继续转移立足点，永远服务工农兵。

笔 卷 惊 涛 颂 风 雷

——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短篇小说

中文系74级二班评论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十年的光辉历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天，祖国旧貌变新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正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肯定还是否定这场政治大革命，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因此，通过文艺的形式，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深刻揭示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意义，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广大文艺创作者面前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短篇小说集《迎着朝阳》（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盛大的节日》（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以及收在朝霞丛刊《序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和发表在其他报刊杂志上的不少短篇小说，为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洋溢着无产阶级战斗激情的作品，犹如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一幅幅壮丽的画图，把我们带回到文化大革命中那如火如荼、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这里有运动初期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旗向走资派进攻的《暴风雨》（《迎着朝阳》）、《迎着暴风雨》（《长江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有一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初春的早晨》（《序曲》）、《工地战旗红》（《武汉文艺》一九七四年第三期），有工人阶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序曲》（《序曲》）、《烈火熊熊》（《盛大的节日》）；有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的《第一课》（《序曲》）、《雨后初晴》（《迎着朝阳》）；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新生的革委会成立后斗争仍在继续的《前进，进！》（《序曲》）、《汽笛声声》、《纳新》（《迎着朝阳》）、《金钟长鸣》（《序曲》）。